

方豪六十自定稿

上
冊

方豪六十自定稿

上
册

編印「六十自定稿」前記

一、爲自己的研究工作與著述作一檢討

民國二十三年，我開始發表一些有關歷史方面的文字。三十一年冬，曾收集十二篇，加以修訂，輯爲「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由重慶獨立出版社印行，直到三十三年纔出版。這一部書未出版之前，我又整理出第二部書，題爲「中國天主教史論叢」，

三十三年十二月，重慶商務印書館印行；收十三篇，亦均加重訂。

我有一個習氣，每篇文字發表後，過了相當時期，如又有新資料發現，或有錯誤需要更正，而有重寫、重發表或重印的機會，我必要修改一番。

三十七年春，我將上述兩書，刪去了幾篇，加上兩書中所未收的和新發表的文字，纂成「方豪文錄」，由北平上智編譯館印行。

編印時，又獲得一次再校訂的機會。惜當時北平已風聲鶴唳，物價時時波動，所以當排到第三百餘頁時，我就自我控制，立即停止，因此有些文字，仍未能收進去。

「文錄」只印了五百部，由北平輔仁大學，以及北平和上海的來薰閣代售。出版後一個多月我即離平南下，重回復旦大學執教。出版後七個月，北平淪入共黨手中；大局突變，全國沸騰。所以「文錄」流傳於世的實在有限得很。三十八年二月，我來臺灣時，隨身只帶了五部，幾天以內，即已送完。全臺灣，加上全球各地圖書館和私人所藏，總計恐不會超過五十部。

去年（民國五十七年）「文錄」出版已屆滿二十年。二十年來，我又發表了不少文字，雖比以前的較爲成熟，但隔了相當時日，每篇仍都有些自己認爲不滿意，和可以修改的地方。

按我國習俗，去年是我虛歲五十九歲；我覺得如要爲自己六十歲留一點紀念，不如再出一次「文錄」。不論新舊文字，重加

一次訂正。一方面對社會有個交代，一方面對自己做學問的過程，也可作一次檢討。

本來仍想取名爲「方豪文錄」，但既然舊稿都已重改，忽然想起前人有四十自定稿、五十自定稿和六十自定稿；我何不也來一個「六十自定稿」？（「方豪文錄」可作爲我的「四十自定稿」。）

我很慶幸我有這樣一個機會。我曾見過不少前輩和同輩，身後由友好代輯文集，不但在取捨方面，已非本人的意旨；尤其重要的是本人已不能作一字、一句、或一段、一節的修改。我不相信一個人的文字，尤其是搞歷史的，在幾年、十幾年或幾十年後，仍能完全滿意於自己過去發表的文字，而可以認爲無須重訂。

二、爲國際漢文著作目錄上兩個「方豪」作一糾正

我之所以要出版「六十自定稿」，另有一重要理由。

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十月，我在美國參觀了好幾個著名圖書館。看到關於我的著作，竟被分列爲兩個「方豪」。大體上是把一些有關於天主教的文字，列在我這個「方豪」名下，而把其它的文字，列在另一個「方豪」名下。我曾在國會圖書館，向恒慕義先生（Arthur W. Hummel）聲明，卡片上或目錄上的那些署名「方豪」的書或文字都是我寫的，是我一個「方豪」寫的，並沒有任何一本著作，或一篇文章屬於另一個「方豪」的。他答應爲我更正，並請所有使用同樣卡片的圖書館更正。

前年（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八月我出席安娜堡（Ann Arbor）第十七屆國際東方學家會議，曾在西雅圖住了幾天，參觀了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圖書館的中文藏書，使我更吃一驚。因爲他們確實已把所有署名「方豪」的著作，一律改爲一個「方豪」；實際上却是錯上加錯，是把兩個「方豪」併爲一個「方豪」。於是在某些書下面，作者是：「方豪字杰人，又字倣新。」（倣新是另一個「方豪」的字）在另一些書下面，我的年齡又突然大了十多歲。

我對於這一同姓同名之累，必須加以澄清。

先說我們兄弟三人的名字都是先父代取的：先兄名英，字俊卿；我名豪，字傑人，後改字杰人；舍弟名雄，字偉臣。就我所知道，和我同時代的「方豪」，共有四人或五人。

第一位「方豪」，字叔新，浙江金華人。年齡不詳，大約比我長十多歲。所以先父爲我取名時，他也只是小學生。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時，他已是所謂「四大金剛」之一。（餘三位是傅斯年孟眞、段錫朋書貽、羅家倫志希）。現在在臺灣的楊亮功先生是他的早年北大同學之一，那位「方豪」就在五四運動那年即民國八年畢業於北大，而楊先生是晚一年即民國九年畢業，所以他的記憶不會有誤。而五四運動時，我只是虛歲十歲的兒童，實際是八歲零七個多月，肄業於設在杭州城內鎮東樓的杭縣縣立單級第一國民學校。（等於改良的私塾）也曾揮舞着「收回青島」「取消二十一條」等紙旗，出發遊行；並在大街上公演街頭劇；記得我扮演的是亡國後的朝鮮某家庭的幼兒。假定那年那位字叔新的方豪是二十二、三歲，他就比我大十二、三歲。

楊亮功先生也告訴我：他自己民國九年畢業北大後，民國十年任安徽一中校長，他邀請那位「方豪」擔任教務主任；十一年，楊先生離開了安徽一中，就由那位「方豪」繼任校長，大約不久，那位「方豪」也到他自己的故鄉——金華，去當七中校長；七中也就是後來的金華中學。

那位「方豪」校長辦金華中學很成功，他的不少朋友和不少學生都這樣說。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我晉升司鐸，屬於杭州教區，二十六年九月，我也奉派到金華教會服務，轄區遼闊，金華外，還包括永康、湯溪、武義等共四縣，在金華時不多。加上那年聖誕節前夕，日軍侵入杭州，我也曾一度到衢州一帶暫避，次年復活節後又回金華。曾見過那位「方豪」幾次，却不太熟。那時我在傳教之餘，也做一些抗敵宣傳和慰問傷兵、收容難民等工作，偶爾也在報上發表一些短文，爲避免混淆起見，我都以「方杰人」署名。

二十七年十月，我離浙入滇，協助于野聲主教復刊「益世報」。現在我還保存着兩篇小文：一篇題爲「雷鳴遠」，在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東南日報「筆壘」一二一期刊出；另一篇題目是「謁九九老人」，兩文都草於赴滇途中，第二篇刊出日期已不復記憶，在剪報上亦未註明，大約是在十一月初。

勝利後，那位「方豪」當選爲國大代表，辭去金華中學校長；不久，浙江省教育廳又派他爲杭州中學校長。大陸變色後，聽說他曾被清算。民國四十四年時，一位服務於政府的朋友告訴我：那位「方豪」業已去世，恐怕是餓死的。

常常有人把我誤認爲那位「方豪」。三十五年，我在北平見到胡適之先生，胡先生也說：「我在美國時，很奇怪我的學生『方豪』怎麼也搞起歷史來？怎麼又研究中西交通史？怎麼也談宗教問題？等我回到南京參加第一次國民代表大會纔弄清楚，當校長、當國大代表的是我的學生『方豪』，研究歷史而又是神父的是我的朋友『方豪』」。胡先生對後進總是那麼客氣，「我的朋友」也是他著名的口頭禪。當民國三十七年出版「方豪文錄」時，即請胡先生爲我題寫書名。

後來，國內的朋友，差不多漸漸都已分別清楚：

那位「方豪」字倬新；我這「方豪」字杰人。（原作傑人）

那位「方豪」是浙江金華人；我這「方豪」原籍浙江諸暨，生於杭州西湖葛嶺山下，曾住過長山門外彭家埠、杭州城內花牌樓、高士坊巷、鎮東樓等地，因當時未設杭州市，故稱杭縣人。

我這「方豪」生於民國前二年；那位「方豪」長我十歲以上。

那位「方豪」以五四運動和曾任金華中學校長著名；我這「方豪」在五四運動時還只是小學四年級學生，一生從未當過中學校長。

那位「方豪」是國民黨黨員；我却無黨無派。

最顯明的是那位「方豪」似無宗教信仰；我這「方豪」却出身於基督教聖公會家庭，民國十年一月九日，全家皈依天主教，我並於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晉司鐸。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我從沒有見過那位「方豪」所寫的任何文字；我想他一定寫過，也發表過，至少像在金華中學校刊上，不會沒有他的發刊詞或題詞之類，可是我問過楊亮功先生，也問過許多金華中學的老學生，他們都說不出一篇來。

爲此，我在這本「方豪六十自定稿」的前面，特地列出我所著、所譯、所編的書目；希望經過這一次澄清，歐美圖書館的中文書籍編目者，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瞭解。

在中文著作譯爲英文時，也有一項困難，即中國人的姓和名的排列前後問題，我希望大家尊重或順從各人的習慣，例如胡適

(Hu Shih)、于斌(Yupin)都是姓在前，可是「適」字的譯名和「胡」字分開，且用大寫；「斌」字的譯名，和「于」字相連，當然不用大寫，這些也得依照各人自己的寫法。我的英文名字是Maurus Fang Hao，我希望別人也照此來寫；不必改成 Hao Fang。

我也用過不少筆名，如：茅廬、絕塵、聖老等。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七年，在北平主持上智編譯館時，曾出版「館刊」，有時因為稿子缺乏，尤其在書評方面，只得化名撰寫，當時年輕，趨好時尚，若干名字竟也女性化，現在說來，自己也覺好笑。

民國四十三、四年時，某天在報上又出現了一位民社黨的中央委員，也和我同姓同名；我曾應朋友們的勸告，在報上登一聲明；不久，又有人給我看一張「方豪」名片，說是香港來的商人。民社黨的朋友告訴我：恐怕就是他們黨裏的那位中央委員。

三十九年五月，臺大訓導處來了一位職員，姓方名仲豪；但他的朋友也曾稱他為「方豪教授」。據那位方仲豪先生告訴我：他過去確也是單名豪，「仲」字是後來加上去的；又因他曾在軍事學校教過書，原稱教官，所以也有朋友稱他為「方豪教授」云云。現在方仲豪先生已於五十六年十一月退休。

三、以「不知老之將至」和繼續不斷努力的精神告慰朋友

先母產我時，是在西湖葛嶺山下「婦女養病別墅」，（早已不存）所以我自幼羸弱，時患頭眩；十二歲後，只要空氣渾濁，或睡眠稍有不足，或頸部衣領太緊，便易暈倒；三十餘年來，平均每年一次；在我已是安之若素，但在別人看來，却無不驚駭；為此，民國五十一年五月底的一次昏厥，遇到經驗比較少的醫生，也曾慌張失措，說了一些恫嚇我的話。某學術機關的一次會議上，還有人認定我已不能再從事於研究工作。五十六年五月初又一次在上課時感覺不適，亦曾昏迷幾分鐘，別人手忙腳亂，我心裏有數，幾小時後，雖被人送入醫院，却已談笑自若。

我感謝別人對我的關懷，但對於沒有高明醫生的證明，沒有我自己的說明，便判斷我不能再做學術研究，不能不略感氣憤。此次從事於二千幾百頁、二百幾十萬字的重編、重校，甚至重寫的大工作，每篇文字至少親自讀校三遍，無異在十個月內要細讀六七百萬字，還要翻箱倒篋，或爬上爬下的取書，而不覺疲勞，只是為向關心我健康的朋友們或非朋友們，證明我還可以做些學

問，並不在許多年輕人之下。根據我最近的體檢結果，再做一二十年規模龐大而又需細心探索的工作，將毫無問題；當然，不測的偶發事件，那只有聽天主的安排。

四、對於本書的若干不滿意處

一是我的作品並沒有全部收在這本「自定稿」中。即如我最早投稿的一些教會刊物，像：我存雜誌、聖教雜誌、新北辰等，現在都無法收集；即到臺灣後發表的文字，亦不能全部保存。

二是不能嚴格分類。譬如最先原定以專題研究爲第一類，在專題研究類中，再按研究的對象以中西交通史、臺灣史等爲序；但發排時，預計頁數的結果，如將所有關於臺灣研究的文字，列入上册，剛剛可以排滿上册；這樣一來，上册中有關中西交通史的文字，固然都屬於專題研究類；而有關臺灣史的文字，却有些通論性或時論性的文字；而若干篇不屬於專題研究的中西交通史文字却只好編入下冊。

三是文體駁雜。我幼年所受的學校教育，是剛從私塾改良的小學，但在家裏所課讀的，却是四書；修道院的國文教學也完全是文言，而以左氏春秋、尚書、詩經以及史、漢文爲主。中年初爲文發表時，也曾一度醉心於白話，並取法近代學術論著的體例，每章每節加註，「李我存研究」便是以這種體例寫成的。只因受幾位前輩的影響太深；又因援引的書籍，既多文言，不知不覺中便也跟着之乎者也起來。

中年又一度爲報館執筆，在不文不白、亦文亦白相習成風之下，我亦隨波逐流，而文白相兼。

初來臺時，由於臺灣光復不久，爲便利一般讀者，又有一個時期出以語體，這實在是近代中國學人應該走的路；無奈，積重難返，不久，我又掉起文來。乃造成此書諸體並陳的一個雜亂局面。

四是各文初發表時，都不開列徵引書目。上册編印時，由於主張每文從單頁起排，遇到若干篇，或雙頁完全空白，或空白太多，而可以補白的短文不多，於是以徵引書目或徵引書文目列於文末。但也有空白不多，而完全不列的。又大多以書目爲限，（原則上不列論文目）中文書在前，日文書次之，西文書又次之；若干篇並加列雜誌名，或發表於雜誌的論文名，但爲數不多。

體例不能一致，我自己亦引以為病！殆亦所謂不能盡如人意處也。

我國詩人喜稱自己所作為「未是草」或「未定稿」，但此書之所謂「自定稿」者，此時此刻之「定稿」也，今日之「定」，在明日言之，仍屬「未定」，則稱之為「六十自定稿」，或者亦無不可。

五、若干令人感奮的事

本書的編印，不如人意處雖然難免，而令我興奮、對我鼓舞的事却更多。

「六十自定稿」之所以不交書局出版，因為書局都希望作者把原稿整理得清清楚楚，然後依次發排，順序校對，以至於付印。而我有一最壞習氣，即每篇付印的文字，除日報無法親校外，期刊上的文字，編者索稿，我的第一條件，是必須親校；編者對此條件，無不頭痛；因為我校對時，往往又添添刪刪，塗塗改改；其次是我略有校對經驗，因此自信心頗強；其實那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六十之年，老眼昏花，儘管是老五號字，亦往往顧此失彼；而自己的文字，讀來比較順口，錯字漏句，不知不覺，都滑溜過去。即如這篇「前記」，曾交「傳記文學」第十四卷第四期發表，在我自以為一個錯字都沒有以後，卻承他們替我又校出四處錯誤。此次我和印刷廠訂約，是整理好一篇，先排一篇，最後再編次序。從五十七年六月發排第一篇，排到二千頁時，（最初預計只有一千多頁）印刷廠已遍地都是我的書版，積壓下來的鉛字、鉛條，在印刷廠也是一大負擔。於是我不得不先把一部分稿提前編目付印，一面仍不斷整理新稿付排；在這過程中，往往還要移動次序；又由於我隨時修改增刪，所以有些稿件，校改至五六次的，並不希奇。而廠方從無怨言，豈不令人感激？

許多位同學的自告奮勇，為我義務校對，也使我非常感謝。其中有畢業很多年的，有遠在南部的，有已在執教的，有還在求學的，他們是盧荷生先生、張秀蓉小姐、車愛光先生、張元先生、張永堂先生、魏宏利先生等。

還有一些要說的話，當留待到下冊末寫「後記」時，再向讀者陳述。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杭縣杰人方 豪謹識

本書撰人之其他著作目錄（已成書者）

（1）中國類思

一冊，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出版。六十七頁。三十二開。是書係受人之託，從拉丁文譯出，用方傑人名，脫稿於民國二十三、四年間，出版在二十九年，時余已在重慶。書前有「承印者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等字樣，可知並非該館出版品。勝利後始獲一讀。手頭久無存本。幸彰化靜山退省院藏有二冊，承以一冊見贈。類思爲義大利文 Luigi、拉丁文 Ludovicu 譯音；法文作 Louis，或譯路易，天主教奉爲模範青年。此「中國類思」姓傳名青山，爲浙江衢州礪上人，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生，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卒於杭州。

（2）李我存研究

一冊，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版。一〇四頁。杭州我存雜誌社發行，列我存叢書第五種。有白報紙三十二開本及道林紙二十開本二種。分二十七節，附雜記、年譜及遺文，有陳訓慈序。此書出版後不久，抗日之戰發生，同年聖誕節前杭州淪陷，故流傳不廣。

（3）李之藻研究

一冊，五十五年三月出版。二四六頁。二十五開。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附插圖十幅。係將前書增訂而成。分十三章，附李之藻先生簡譜、西人原名檢查表、徵引書目略、英文提要。商務出售者係平裝本，作者贈送者係布面精裝本，燙金字。

（4）杰人論存

一冊，三十年四月出版。一六四頁。三十二開。是書副標題爲「益世報社評選輯」，香港國華圖書印刷公司發行。其中三

十一篇爲余所自輯，八篇係他人所作，亡友葉秋原先生誤收。此次「六十自定稿」中特予刪除。

(5) 徐光啓

一冊，三十三年六月出版。手工紙，一一二頁。三十二開。爲「中國歷史名賢故事集」第三輯「學術先進」之一。重慶勝利出版社發行。現存十一章，第八章與第九章之間，被刪去「治家模範」一章。又第十一章原名「師友弟子記略」，被刪去一部分，改爲「光啓西友記略」，原稿在三十四年四月八日重慶益世報副刊第八十四期「宗教與文化」單獨發表。此外第一章時代背景，二、「社會背景」、第二章、第五章、第九章有若干段被刪。第六章「施政計畫」，一、「國防計畫」被改爲「抗敵計畫」。

(6) 徐霞客遊記選註

一冊，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渝初版、九月再版。(手工紙本)三十五年四月滬一版。(報紙本)八十頁。三十二開。原係重慶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爲青年文庫之一。凡三十七節。書首有長序。

(7) 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第一輯)

一冊，三十一年冬脫稿，三十三年四月出版，重慶獨立出版社印行。手工紙，二六二頁。又正誤表二十三頁。三十二開。列入「現代學術叢書」，名爲第一輯，實未出第二輯。共收文十一篇，第十二篇爲「與友論學書」。末附「擬十七世紀中外文化交通史要目」。第九篇「同治前歐洲留學史略」漏留學生簡表。

(8) 紅樓夢新考

此爲前書中之第七篇，因共有四十二頁，且較有吸引力，故重慶獨立出版社爲之單獨印行。「六十自定稿」已重寫。

(9) 中國天主教史論叢(甲集)

一冊，三十三年十二月出版，重慶商務印書館印行。手工紙，一五七頁。三十二開。共收文字十三篇。列入「中國公教真理學會叢書」。名爲甲集，以下諸集未出。

(10) 外國史大綱

一冊，三十四年某月出版，重慶正中書局印行。一九一頁，手工紙。三十二開。現在余所存者爲四十二年四月臺一版及四十七年一月臺三版，皆印書紙本。列入「青年基本知識叢書」。該書係在撞車療傷時期完成，故缺點頗多。一七四頁第七、八行與一八二頁第七、八行有重出文字，尤爲詬病。加以出版至今已二十餘年，已請求正中書局停止發行。

(11) 馬相伯先生文集及續編（編）

文集一冊，三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出版，北平上智編譯館發行。印書紙本，共四六四頁。二十開。陳垣序。附編者所撰「馬相伯先生事略」及「凡例」。全集按年排列。有原稿者據原稿，有刊本而曾經先生修改者從修改本。共一八二篇。末附增編十四篇，家書節錄六十六通，最後爲編者附言。

續編一冊，三十七年一月十日出版。北平上智編譯館發行。印書紙本，共九十六頁。收各種文七十六篇。末有「編後附言」。

(12) 方豪文錄

一冊，三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出版。北平上智編譯館發行。代售處北平輔仁大學、北平及上海來薰閣。是書共三五八頁。限造洋宣紙本十部，編號壹至拾；道林紙本四十部，編號一至四十；報紙本四百五十部，概不編號。惟此書出版後七月，北平即告淪陷，故流傳不廣。共收文三十九篇，末附增補及英文篇名。

(13) 天樂正音譜

一冊，毛邊紙，絲線裝，十八葉，在臺北印刷，三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付印。原書係康熙間名畫家吳漁山司鐸歷作，上海徐家匯藏書樓藏抄本，余借出校訂，因戰亂携來臺灣，與鄭因百教授篤同校，余並作注釋。

(14) 裨海記遊（附五種）合校足本

一冊，毛邊紙，絲線裝，六十七葉，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列臺灣叢書第一種。是書原爲康熙時來臺採疏之郁永河所作。書有余所作長序，考撰人及版本等。現已改撰，分題收入「六十自定稿」。所採用合校者凡十二種。附郁氏所撰渡海輿記、番境補遺、宇內形勢、海上記略、鄭氏逸事。末有余所輯文獻彙鈔。有二種：其一天地較寬，乃專送余作爲酬勞者。

(15) 臺灣民族運動小史

一冊，四十年六月出版，正中書局發行，五十四頁。三十二開。末附「孫中山先生和臺灣的關係」「羅福星先生和臺灣民族運動」二文。

(16) 新世紀教科書初中歷史第一冊、第四冊

本書係世界書局發行。第一冊民國四十年八月初版；第四冊四十一年七月初版。第一冊十章，敘述世界人類的文化曙光、我國古代的歷史、我國有文字記載的開始、由部落到封建、孔子與墨子、由封建到統一、交通與工商業、水利與農業技術。第四冊八章，敘述東亞大陸的大帝國（清）、日常生活的演變、歐洲各國、西歐各國的殖民事業、東西文化的交流、產業革命、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太平天國的演變與其失敗。

(17) 中西交通史

五冊：第一、二冊四十二年一月初版；第三冊四十二年十一月初版；第四冊四十三年五月初版；第五冊四十三年五月初

版。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第一冊二五八頁、第二冊二七一頁、第三冊二八一頁、第四冊二三四頁、第五冊二二八頁。三十二開。第一冊自史前至魏、晉、南北朝，第二冊爲隋、唐、宋時代，第三冊爲元代至明代中葉，第四、五冊爲明末至清代中葉，又名「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

(18) 宋史

二冊，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第一冊四十三年七月初版，一五六頁，第二冊四十三年八月初版，二三五頁。三十二開。第一冊爲北宋部分，包括宋代之官制、宋代之軍隊、宋代之文風等專題；第二冊爲南宋部分，包括宋代之賦稅與財政、宋代之專賣、宋代之貨幣、宋代之人口、宋代之交通、宋代之城市、宋代之文學、宋代之史學、宋代之地理學等專題。第二冊因專題太多，南宋史事之敘述，殊嫌簡略，亟需重寫。兩冊由於余疏忽而致誤及由校對不夠嚴格而誤植之處甚多。上課之時，用作講義，隨講隨囑同學校正，不勝其煩。如有機會重編重印，或可稍贖余之罪愆。惟出版以來，國內僅超陽先生在「反攻」第一八九期指出第二冊末附錄「宋代行政區域之劃分」北宋仁宗時期之十九路有誤，至爲感激。

(19) 天主教教義問答

一冊，自印本。四十三年聖誕節初版五千本；四十四年八月再版五千本，加「重要祈禱文白話譯註」；四十五年二月三版一萬本；四十九年五月四版五千本；五十年十月五版五千本；五十二年二月六版五千本，在八年餘時間中，共印三萬五千本。現已停止重印，如有時間，準備重編。

(20) 中國近代外交史

僅出第一冊，四十四年八月初版。二二六頁。三十二開。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印行。第一冊出版後不久，即爲人剽竊，略改詞句及章節而另行出版，故第二冊以下即不再續出。

(21) 主日彌撒經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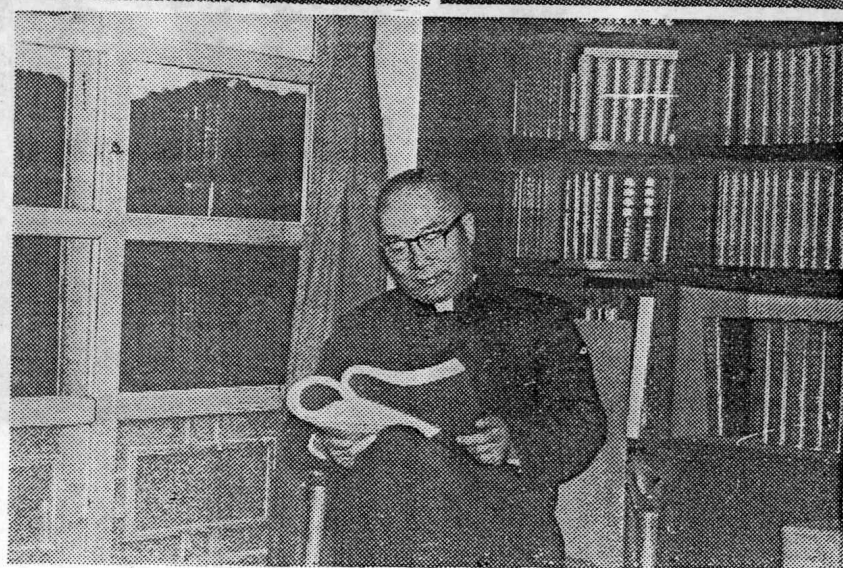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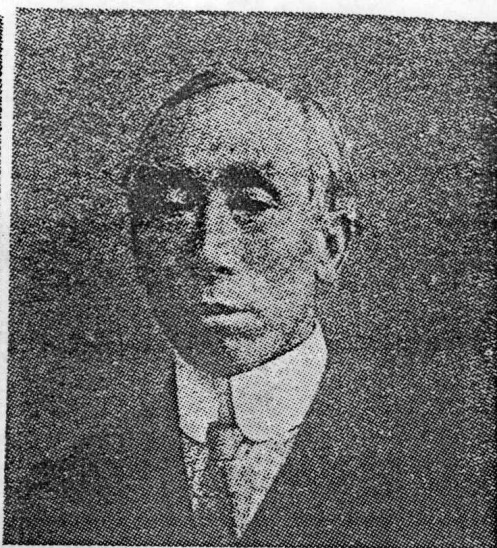
民國四十五年春，受華明書局慈幼會會士之託而翻譯。以美軍通用之 *My Sunday Missal* 為根據，在當時由余創辦並由余負責領導之臺北教區大專天主教同學會之聖母會會員中，選十六人，每四人一組，共四組，每組負責翻譯三個月之主日彌撒。一為訓練翻譯，二為增進對彌撒之瞭解與虔誠，三為加強團結合作。而最主要之理由，則因當時年事稍長之聖職人員，因熟讀清末民初上海土山灣、河北獻縣、北平北堂及山東兗州等教會出版機構出版物影響，甚多教會特有名詞、成語、句法、筆調等，與一般社會書刊格格不入；而此輩大專學生，多在臺灣受洗，未受教會舊書刊影響，不致發生上述現象。譯後再由余以拉丁文對照修改潤色。余撰有序文、彌撒小引及編譯凡例。余在序中有云：「雖歷時僅百餘日，但易稿數四，每晚往往工作至夜半，而精神煥發，了無倦容，冥冥中實有神助。」慈幼會所付之稿酬，則作為十六位參加翻譯之同學旅行阿里山之費用。在凡例中曾聲明「舊約各部分，大體上採照或引用思高聖經學會譯註『舊約全書』；新約福音部分以採用上海徐匯總修院所譯四福音為原則，但亦略有修改；新約書信、宗徒大事錄等部分，則完全新譯」。書譯成後，慈幼會已脫離華明書局，乃由余出資付印，有硬面本及軟面燙銀本二種，同年九月十五日出版壹萬本。共三六四頁。五十開。已絕版。

(22) 光啓聖歌集

一冊十三首，全部由余作曲，七首由余作詞。四十七年十一月臺中光啓出版社出版。

(23) 短篇一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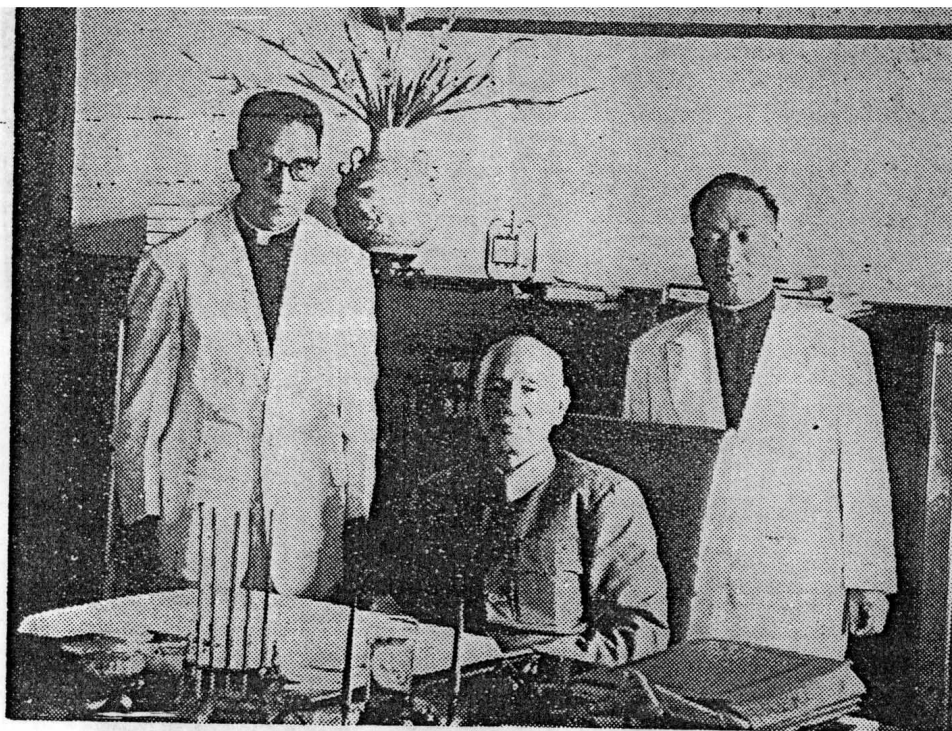
副標題「寄男女青年」，一冊，共二三六頁，二十開。五十一年十二月初版，臺中光啓出版社印行。收有關讀書、修養及



作者謹以此書奉獻

先父在天之靈

先父諱矩，又名壽彭，字丹仙，號錫菴，亦作雪菴，籍諸暨。先母黃氏，諱修梧，籍海寧長安。作者幼年讀書之興趣及對文史之嗜好，受先父啓迪甚多；但自幼多病，先母養育照顧，尤爲辛勞。書成之日，謹誌此以示不敢忘本之意。



民國四十
六年六月
陪同旅法
三十餘年
之黃家城
司鐸晉謁
總統時
留影
胡崇賢攝